



月圆之夜

■石泽丰

月亮从山的那边，悄悄升起来。我透过窗，看清那硕大圆润的样子时，它已爬上了山顶的树梢。山里，暮色与宁静结伴而来，夜还未深，人们习惯早早入睡。远近剩下的，只有鸟兽的鸣叫，点缀着山乡之夜。

我寄宿在一个名叫木塔的山区，屋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，木板隔成内墙，简陋但安静。躺在老式木床上，月光皎洁，星空万里，想起白天这家九十七岁的老翁讲述当地妻送郎参军的故事。

“它可以为证，月光可以为证。”老翁指着自家门前山岗上的堡子说。他视力不好，却清楚地知道堡子的方向，一如当初，他的父母将革命胜利的曙光指给他看一样。不过现在，堡子失去了当初瞭望的功用，守堡子的人也不在了。

我坐在老翁身边，听他回忆往事。

那是1934年的农历十月，当地正在开展土地革命，农民分得土地，收获了胜利果实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，大家全力支持红军，纷纷从家中拿出床板、铺盖和

食物。那个月的十七日，他的邻居汪林辉新婚刚满七天，毅然要去参军，并得到了妻子计云梅的大力支持。汪林辉要在天黑前离家，计云梅便倾家中所有，做了一桌饭菜，为丈夫送行。临别时，他接过妻子手中的行装，拉着她的手，深情地说：“我会保重自己的，等革命胜利之后，我会选择一个农历十五的月圆之夜回来与你团聚。”计云梅眼含热泪，许久才松开丈夫的手，把这句话牢记在心里，目送他从山地出发，踏上革命之路。

月光之下，计云梅送走了丈夫，新娘送别了新郎，这个新婚的家，如深夜的大山一样寂静，她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。冬去春来，四季更迭，以后每个月的月圆之夜，计云梅都要烧上一桌好菜，翘首盼望丈夫归来。其实，汪林辉参加红军不久就血染战场，数年后计云梅得知消息，仍不相信丈夫牺牲的事实，依旧守着承诺，直到自己病到卧床不起。

那天，正好又是一个十五之夜，圆月如期爬上枝头，计云梅弥留之际，一会儿看看窗外，一会儿看看空空的饭桌。这时，看望她的乡亲们意识到了，立即各回

各家，每人做上一道菜，纷纷端至计云梅家，并摆上碗筷。望着满桌饭菜，计云梅老人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，随后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离开了这个曾经的婚房，离开了这个让她等待、守望了一生的家……

老翁断断续续的讲述，与我白天在木塔红军纪念馆听到讲解几乎一样。红军纪念馆中，计云梅斜靠在床上的蜡像栩栩如生，一条花布薄被盖着她的双

腿，旁边有一张八仙桌，床的一侧是一扇木格窗户。一束如月光一样的灯光照射在她身上，柔和又宁静，她眼中充满了期待，目光牵系着远方。

一世夫妻只有七天，这就是计云梅的故事，这也是经历深重灾难的中国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的故事。千千万万个她们，用一生的辛劳和等待，谱写了一曲至死不渝的悲壮之歌。

世间妈妈树

■鲍安顺

在云南怒江的傈僳族自治州，有一棵“妈妈树”，树干粗壮，四个人才能环抱。当地人崇拜它，在树下祭奠，表达心愿。也有男女青年，背靠大树高声对歌，抒发爱慕之情。当地人说，女儿节时有人给它扎红，中秋节时有人给它送月饼，端午节时有人给它捐花烧香，母亲节时为它献歌。很多游人在密林深处，四处寻找这棵“妈妈树”，希望幸福好运，希望自己的妈妈安康长寿。

北京的温榆河畔，也有一棵“妈妈树”，

它在金盏乡小店村周王庙西边，是棵大松树。这棵参天大树，最少要六个人才能合抱，树干中有一个硕大的树瘤，宛如妈妈头后梳的一个鬟儿。温榆河畔的“妈妈树”，是北京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之一，在城市建设改造过程中，政府呼吁人们要像珍惜古老的文物一样，爱护这棵“妈妈树”。

听说摩洛哥西部平原上有一种名叫“蓬迪卡萨里尼特”的树，意思是“善良的妈妈”。这种树的花球洁白美丽，最为奇特的是，花球凋落时，花球的蒂托处结出一个椭圆形奶苞，苞头顶端则生长了一种像椰条状的奶管。奶苞成熟后，淌出黄褐色的汁液，所以此树又称“奶树”。

更有趣的是，这种树不通过种子繁殖，而是从树根上萌生出新苗，幼苗丛生在大树周围，像小孩依偎在母亲的身旁。大树分泌出的汁液，由奶管向下滴落，幼苗用叶片拼命地吮吸，生长发育。小树长大一些后，大树从根部与幼苗断裂，给小树“断奶”。分离出小树后，大树开始凋零部分树叶，让小树充分吸纳阳光雨露。不得不说，大自然有如此不惜牺牲、精心抚育后代的树，不愧为“善良的妈妈树”。

有次去厦门看海，在暮霭沉沉的海岸边，曾看见鳞岬斑驳的砾石中站立着一棵树。海风吹拂，它摇摆身姿，孤独而忧郁。听说从前有个渔民的儿子出海捕鱼，再也没回来，他的母亲在岸边站了很

久，守望成了这棵树，后人就把这树叫作“妈妈树”。望着那棵树，我突然有种奇怪感觉，那树仿佛我白发苍苍的母亲，正在注望远方，好像期待我早早回家，或者一路顺风快帆，抵达人生的风景之地。

有则寓言中讲到，一个小孩在一棵大树下游戏，大树将最鲜美的果实给他。十年后，小孩长成了青年，因为婚嫁大事，他在大树下忧郁，大树告诉他，可以把它的树枝砍了，建一座漂亮的房子，那样就能在新房中结婚，从此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。又过了十年，青年成了中年，他满腹愁云地去找大树，说自己没有实现理想，渴望去外面闯一闯。大树听了说，把它的树干砍了，可以造一艘大船，这样就能驾驭大船，去追求一番事业。过了三十年，小孩成了白发老翁，他精疲力竭地回到大树身边，心情沮丧，神情落寞。大树安慰他：“在外面累了，吃了多年的苦，现在回来了，就请在我仅有的树桩上，坐一坐，好好休息吧。”

其实，这棵大树就是一棵“妈妈树”，因为世上只有母亲才像这棵大树一样，对儿女无私奉献，倾其所有让你结婚成家，为你实现理想牺牲自己，让你平安走天涯。即使你一无所有，回到了她的身边，她仍然疼爱和你关心你，让你靠在她弯曲的脊背上，休养歇息。

妈妈啊，是我们生命里那棵永远依靠的大树！

母亲的手



■刘元元

岁月无痕，可母亲的手却在时光的雕琢中，渐渐粗糙了，长斑了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小镇的供电工区上班，每天早出晚归。农活、家务、照顾我们姐弟的日常生活，全压在母亲肩上。但她从不诉苦，也不言累。

母亲下地时，常让我带着弟弟坐在地头等她，春天撒种秋天割，我们看到母亲的辛劳得到了收获，总能收到意外的惊喜。春天，母亲采来各种野花送给我们；秋天，从地里摘回龙葵，那是童年最美味的小吃。那时的母亲，每天忙碌，一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

九岁那年，我们全家从小镇搬到了县城。在小镇时，家里房子很大，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蔬菜，还有各种的小花。搬到县城后，家里没有地，新买的房子又矮又小，院落里只生着几株狗尾巴草，生活仿佛突然变成了灰色。

父亲一人工作供养全家，日子过得拮据辛苦。母亲发现邻居阿姨们都做小生意赚钱，便跟着她们凌晨五点去批发水果，白天上街推着车卖，每天都得很晚回家。从那时起，她的手开始变得粗糙，茧子渐渐发黄增厚，我的手被她握在手里，依然温暖，但却像触碰到小刺和胡茬一样不自在。

后来，母亲被分配到河道管理所后勤上班，她在食堂努力学习，直到练得一手好厨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母亲下岗了，为了减轻父亲的重担，她经常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各个小镇上赶团集，售卖裤子。那时，附近的集市开着，最近的离家十里地，最远的七十里地，她经常凌晨起床，骑车进货。酷暑和严寒里，她那双越来越粗糙。

有一年暑假，我去集市找母亲，看着她憔悴的脸、那双皴裂的手，深深刺痛了我。那一刻，我暗下决心，决不辜负她的爱和辛劳，要努力让她欣慰。

几十年来，无论多苦多累，母亲毫无怨言，用柔弱的肩膀和父亲一起撑起我们的家。我大学毕业时，多年劳碌的母亲得了腰脱和眩晕症，渐渐开始居家休养，停止了奔波。我们姐弟参加工作后，她依旧操持我们的生活起居，精心准备一日三餐，叮嘱我们好好工作，用心生活。

时光匆匆，母亲老了，手背开始变得肤色黯然，长出了星星点点的老年斑，像岁月的印记，但在我眼里，那是光阴对母爱的礼赞……

（作者供职于辽宁锦州黑山县供电公司）

读信入梦

■崔向珍

1984年初夏，我帮母亲收完地里的麦子，又点种上夏玉米，准备进城打工。

我的行李很简单，几件还算囫圇的旧衣服，装在母亲缝制的编织袋里。一支寒假前老师奖励的新钢笔，几本刚刚学了没几页的课本，还有父亲送我的一本《在人间》，都装在母亲新缝的蓝布书包里。

我离开家时，村南的春玉米已经长了八九片叶子，正在争先恐后地拔节。母亲送我过了那座熟悉的小桥，在我家地头站了许久，不停叮嘱我：“出门在外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”在滚烫的泪光里，我一步一回头的走远了，绿树红瓦的小村庄，层叠着我脚印的小桥，母亲不停挥动的手臂，都渐渐模糊，只有那句“多给家里写信”，还在炙热的南风中回响。

城里的高楼大厦让我惊喜，车水马龙让我惊慌。想家的夜晚，我铺开信纸，给父母写信。我想念家人，想念坐了一年半的教室，想念村前的小桥……想说的话太多，却只能将它们和苦涩的泪水一起吞进肚子里，告诉家人在城里很好。

父母很快回了信，他们各自写了一页信纸，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。除了一些用心的嘱咐，他们都把“对不起”三个字写在了纸上。无数个想家的夜晚，我翻来覆去读父母的来信，任由泪水一次次模糊双眼。我买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，把想对父母说又不能说的话都写上面，用来释放心里的苦闷。十四岁的孩子，实在背负不起太多生活的重量，心里委屈时，极度渴盼家里来信，特别是母亲的来信。

睿智而细心的母亲，写在纸上的每一句话都直抵我心灵的深处，如同春天的阳光，静静抚平我的伤

痕。我把信捧在手里，迫不及待地品读，为了保存它们，还特意买了一个大号牛皮纸袋，放在工作台的抽屉里，还上了锁。

在城里的第一年，父亲抱病，母亲替他教学，还要下地干活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，常常忙得废寝忘食，可是给远在异乡的女儿写信，却是她最上心的事。每个深夜，她静静地坐在桌边，把家里的幸福和快乐写给我，嘱咐我安心工作。

一年一年春暖花开，一年一年燕去燕来，母亲写给我的信足足装了三个大牛皮纸袋。中秋月圆的夜晚，春节的鞭炮声里，我一遍遍拆开这些信，再一次次封装，整整齐齐摆放在枕边，安然地沉进睡梦里。

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这些被我视若珍宝的信件，还有《人民文学》的一封手写退稿信，以及少部分现金粮票，都被窃贼偷走了。窃贼或许以为，这精心保管的牛皮纸袋里应该存着值钱东西。

这些再也无法找回的信件，让我痛苦了很久。为了抚慰自己，也为了不再让母亲苦苦思念，1990年春天，我毅然放弃了城里轻松的工作，回到家乡。

那些丢失的信件，我从未跟母亲提起。如今，我们离得更近，已至耄耋之年的母亲常常念叨她和我之间那些信。我写给她的信，一封封都完好地保存在书橱中，可她写给我的信，却只能在酸涩而美好的记忆中回味了。

（作者供职于山东东营市方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）

